

# 周族的起源地及其路线

杨善群

周族创建了西周王朝，在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在名义上还是天下的共主。周族在中国的统治长达八百多年。可是关于周族的起源地及其在太王亶父以前的路线，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先周文化遗址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和发掘，史学工作者进行了更为热烈的讨论。本文即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一些考核和辨析，以求对太王以前的周族历史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了解。

## 一、周族的起源地在晋西南

周族的始祖名“弃”，为“后稷”之官，这是有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而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至于弃所处的时代，应该是在尧、舜、禹之际。《墨子·尚贤中》引“先王之书《吕刑》”曰：“（尧）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禹平水土，……稷隆播种。”《书·尧典》载帝舜曰：“弃，……汝后稷，播时百谷。”《汤诰》又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孟子·滕文公上》云：“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后稷教民稼穡。”《诗·鲁颂·閟宫》“称周之始祖后稷：‘奄有下国，俾民稼穡’；奄有下土，缙禹之绪”。《逸周书·商誓解》并载周武王之言：“在昔后稷，……克播百谷，登禹之绩。”上述先秦古籍，所叙周祖后稷的事迹，几乎是一致的。有些著作虽然晚出，但它们都当以可靠的史实为依据。故《史记·周本纪》总结道：“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古本《竹书纪年》有一条记载：“后稷放帝（尧）子丹朱于丹水。”这个“后稷”当也指周之始祖弃。《国语·鲁语上》载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礼记·祭法》在引述这段文字时将“夏之兴”改作“夏之衰”，与其他各种记载不合，显然是不对的。《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蔡墨曰：“稷，因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杜预注：“汤既胜夏，废柱而以弃代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并引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云：“则知弃本商稷。”杜、杨二注，把弃当作商代之稷官，完全曲解了传文之义。《左传》所记蔡墨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自夏以

上”以柱为稷神而“祀之”；至商朝因弃的年代已很久远而奉为稷神，故“自商以来祀之”。这进一步证明，弃活动于唐、虞及夏初，与尧、舜、禹同时。

明确了弃为后稷的时代，就可以进一步探讨弃所在的地域了。《诗·大雅·生民》称周始祖后稷“即有邰家室”，《史记·周本纪》则点明帝舜“封弃于邰”。显然，所谓“有邰”或“邰”，就是周人的起源地。邰的地望，学术界有不同的二说：一说在陕西武功县，一说在今山西西南部闻喜、稷山一带。从各方面的记载来分析，邰最初的地望应以后说为是。《左传·昭公元年》记子产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水宫之长），生允格、台骀（此字以下用～代）。台～能业其官，宣（疏通）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则台～，汾神也。”台～二字音同，故可简称为～，后人又把神名变为地名。《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室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芮、岐、毕，吾西土也。”上列“西土”五地，“魏”与“芮”均在晋西南汾河与黄河之间，则夹在其中的～当也在此一带。杜注及许多注释以～在今陕西武功县是错误的。詹桓伯列举周疆土开拓的地名，不可能河东河西跳着乱叙；且～为汾神，不可能跑到陕西。由此更可见，周“自夏以后稷”开始的起源地在“魏、～、芮”所在的山西，以后才发展到陕西的。《国语·鲁语上》有云：“稷勤百谷而山死。”韦昭注：“稷，周弃也，勤播百谷，死于黑水之山，《毛诗传》云。”不知“山”在何处。其实，在山西闻喜县之西、稷山县之南，至今犹有稷王山，“稷勤百谷而山死”之处当就在这里。

周人往往以夏的继承者自居，这也是一个周族起源于晋西南的有力明证。《诗·周颂·思文》称后稷“陈常于时夏”；《书·康诰》记周公赞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君奭》又谓“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更宣传上帝“侖（使）我有夏式（代）商受命”。周人常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称为“有夏”，说明他们与夏朝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夏朝活动的主要区域就在晋西南，许多记载都把那里称为“夏墟”。《左传·定公四年》述周王室分封唐（晋）国时，“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据考证，晋国之初封即在今山西翼城县一带。《史记·吴世家》又述周武王克殷后，“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据《集解》、《索隐》的注释，此所谓“夏墟”在今西安邑县南。再说《国语·周语上》云周之先祖曾“服事虞、夏”，而虞舜的活动地域也在晋西南。许多史学家指出，周族之初可能属于“陶唐、虞、夏之际”一个大部落联盟

中的一支,周族之姓“姬”与夏族之姓“姒”古本音同相通。唐、虞、夏、周部落的首领原先曾在一个部落联盟中共事,后来周人又在夏政权中任职,与夏族的关系相当融洽。惟其如此,周人常称自己之国为“有夏”,就是很自然的了。

这里还应当辨析的是,历史上姜族的活动地域,因为弃之母曰姜嫄(此字以下简作“原”)。姜族固然起源于西方,是从羌人中分离出来的,但它很早就已经东迁。《书·尧典》、《国语·周语下》、《史记·齐世家》都记有“四岳”佐禹平水土的事迹,而四岳即为姜姓。据王玉哲先生的考证,“四岳”实即“太岳”,“因形近而讹”,太岳“即今山西(中)南部的霍太山”“四岳”当就是霍太山(亦称太岳山)一带的部族首领。既然活动于今山西中南部的姜姓“四岳”曾佐禹平水土,则姜原在晋西南生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传说姜原为“有邠氏女”,“邠”与汾神之~及晋西南的地名~音同相通。有邠氏活动于汾河下游,以神名和地名为其氏族名,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能说明周族起源于晋南的是,那里有许多关于周族始祖的地名、传说和古迹。《水经·汾水注》云:“汾水又径稷山北,(稷山)在水南四十里许,……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隋图经》曰:“稷山在绛郡(今山西稷山县),后稷播百谷于此山。”据说在稷山县,村村有稷王庙,亦多有稷王娘娘庙。县南有稷王山,“相传稷王弃随其母姜原常往来此山,教人播种。”闻喜县西北稷山下有姜原墓。墓旁有冰池,传为姜原弃后稷处。民间流行姜娘娘生稷王爷而弃之的传说。每年夏历三月初一,还要举行“姜娘娘庙会,香火甚盛”。这些地名、传说和古迹,应该事出有因,不能简单地用“附会”二字一笔予以否定。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也为周族起源于晋西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报导,“在河东,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先后在河津、稷山、新绛、绛县、翼城、襄汾、临汾、曲沃、侯马、夏县、运城、解州、闻喜、永济等县共发现夏文化遗址三、四十处”。这些遗址中,很可能也有先周文化的遗存。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山西太原附近光社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联裆鬲,其特征几乎与先周文化的联裆鬲完全相同。由于光社文化的联裆鬲比先周文化的都早,因此学者们推定,“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这就把周族的源流建立在可靠的考古学分析的基础之上。

自1931年钱穆在《燕京学报》第10期上发表《周初地理考》,提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

河之东”的论说,六十年来,经过广大史学和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证据愈来愈丰富和确凿。这个论说,应该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写进一般的历史教科书中。

## 二、夏朝前期迁至关中

作为周族起源地的郃,还有一种记载认为在今陕西武功县,历来许多文献皆如是说,那里也有一些纪念周先祖的古迹。《水经·渭水注》记“渭水又东径黠县故城南,旧郃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诗》所谓‘即有郃家室’也。城东北有姜原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括地志》亦云:“故黠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郃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原祠。”明代康海《武功县志》并载:“古黠城在县南八里,漆村东,古有郃氏之国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武功郑家坡遗址发掘得许多先周文化的遗物。据分析,“武功郑家坡各型(陶)鬲都延续至西周,早期各型鬲分别是西周同型鬲的祖型。……盆的特点是深腹,特点与西周盆一致。其余簋、豆、钵、盘、尊等特征与西周一致,但形制都早于西周。”“郑家坡遗址出土的卜骨、生产工具与西周的卜骨、生产工具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遗址的房屋全为半地穴式,特点与沔西早期的房屋相同。”“郑家坡出土的铜鼎正是西周初期高柱足铜圆鼎的祖型。”如此看来,似乎今陕西武功县一带又是周先祖姜原、后稷生活的地方,是古郃国的所在地。

为什么在山西的稷山、闻喜和陕西的武功,两地都有“郃”(~)的名称,都有关于姜原、后稷的古迹和传说,都可以在考古学上找到先周文化的遗存?杨升南同志正确地指出:“此乃古人时留下的足迹。古人时,常把原住地的地名一起带走,以名新居地。”“两个郃地都与周族早期的活动有关”。他举例说明:商朝的早期都城“亳”就有多处;春秋时晋都“绛”由今山西翼城县迁至曲沃县后,仍以旧名称之。这些无疑都是有利的证据。周族的先祖姜原和弃应该生活于晋西南的稷王山,因而那里有姜原弃后稷的古迹和弃教民播种的传说。后来周族到陕西武功,为纪念其先祖创业的功绩,仍以“郃”称呼其新居地,并在那里布置了祭祀先祖的场所。

周族从山西的稷山、闻喜一带迁到陕西武功的时间,杨升南同志认为在“不窟”(此字以下用“窟”字代)时。但《水经注》、《括地志》等许多历史记载都明确指出:位于今陕西武功的郃地,是“后稷之封邑”。《汉书·地理志》在“右扶风”所属的“黠”县下,有班固的自注:“周后稷所封。”故陕西的这个“郃”,也是“后稷”的居住地,而非不窟所迁之处。

不过,这个居住在陕西郃地的“后稷,已不是周的始祖、姜原之子弃。《史记·周本纪》曰:“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是知周祖后稷不止一人。《国语·周语上》引周室祭公谋父的话说得更明确:“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可知从“虞、夏之际”到“夏之衰”这样一段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周的先祖世世代代都为“后稷”之官。《史记索隐》引谯周按:“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清初学者戴震考述:“盖不窋已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然则周族之由山西迁往陕西,就在始祖弃之后“不知凡几传”的“世为后稷之官”时。

从虞、夏之际的弃到夏朝行将衰亡时的不窋,周先祖世为后稷之官有数百年,其由山西迁往陕西,具体究竟应在何时呢?查史书记载,夏朝前期太康当政时有一次大乱。《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集解》引孔安国曰:“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反国。”《左传·襄公四年》对这件事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今河南滑县东)迁于穷石(今河南洛阳市南),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用寒浞为相,旋又被寒浞所杀。夏臣靡逃奔有鬲氏(今山东德州市东南),利用夏民“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又灭浞之二子所建之过、戈二国,夏朝才得以中兴而稳定下来。《后汉书·西羌传》也说:“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可见夏太康失国其动乱程度之剧烈。作为后稷之官的周族祖先,必因夏政权的颠覆和四夷之叛乱,无法在晋西南再呆下去,乃率领族众,溯黄河、渭河而上,到达今陕西中部的武功。夏太康是夏启之子,可知周族因避太康之乱由晋西南迁往关中是在夏朝前期。至少康中兴夏朝局面稳定后,周族祖先当继任后稷之官,而以其新迁居地今关中的武功,作为后稷之封邑。

### 三、夏末商初遁入甘肃庆阳

周族至不窋时又有一次大的。《国语·周语上》载:“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窋是周族自弃之后又一个有名的祖先。《左传·文公二年》论祀之礼云:“禹不先鯀,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可知不窋在周族历史上的地位实相当于夏之鯀和商之契,是十分重要的。关于不窋的世系,崔述《丰镐考信录》谓:“不窋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后稷者,不窋非弃子也。”其说甚确。所谓“夏之衰”,大多史家均认

为在孔甲至桀时。《史记·夏本纪》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此时蛮夷入侵，四方骚乱。《后汉书·西羌传》曰：“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同时商族的势力迅速兴起，在取代夏朝之后，也向西步步进逼。近年来，在陕西中部的蓝田、西安、扶风、，岐山、礼泉、耀县等地，都发现了不少商代铜器，且其年代都属商早期，与郑州二里岗期基本同时。这“说明远在盘庚迁殷以前，关中东部及至渭河北岸广阔沃野已是商王朝势力范围”。居于今陕西武功、隶属于夏政权又为夏族分支的周族祖先，可能受到蛮夷和商朝两股势力的夹击，无法再在原地生活下去，于是向西北方向迁移，“自窜于戎、狄之间”。

不窟所至之地，历史记载都相当明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窟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元和郡县志》卷三《关内道·庆州》记：“后稷子不窟奔戎狄之间，今州理东南三里有不窟故城，是也”；《庆阳府志》亦载：“不窟，后稷之后，值夏德衰乱，窜居北豳，即今之庆阳也。”三志所述，都说不窟避乱至今甘肃庆阳建城而居。相传不窟坟在庆阳县城东山颠；县东十里地多花木，为“不窟遗园”。庆阳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较多，是一个较理想的耕作区。不窟率周族来到这里后，当即垦殖播种，大搞农业。据清乾隆年间修的《甘肃通志》载：庆阳府至今其民“好稼穡，务本业，有先王遗风”。可知不窟确实到了今甘肃庆阳地区，在那里辛苦经营，发展开拓。他的路线应该是从今陕西武功出发，沿着渭河的支流泾河、马连河，溯水向西北而上。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夏末避乱窜至庆阳的是周族祖先中最后一任后稷。《史记·周本纪·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后稷纳结氏，生不窟。”《左传·宣公三年》亦载郑石癸曰：“吾闻姬、媯耦，其子孙必蕃。媯，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然则不窟为后稷娶媯氏女所生。查庆阳附近的媯姓之国有密须，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商末为文王所灭。后稷奔甘肃庆阳，纳媯姓的密须女而生不窟，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后稷在夏末动乱中失官，率众，仍可袭用其旧号，至不窟出生，不再任稷之官，才取以一个特别的名称。

周族祖先曾在甘肃庆阳一带活动，也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地下发掘资料所证明。据甘肃省博物馆在五十年代末的统计，“甘肃东部的渭河、泾水、西汉水等流域，发现周代遗址，共计57

处”。1978~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时,在甘肃东部又发现了若干处新的先周文化遗址,如镇原县的常山遗址和高庄遗址,灵台县的妻家岭遗址和姚庄遗址,在此之前发现的还有平凉县的安国镇遗址和庄庙遗址,泾川县的蒜李遗址等。据专家们的分析,平凉县安国镇出土的陶鬲,在形制、质地上更接近于西周的陶鬲,它们之间有直接的承袭关系。由此可知,周族祖先在今甘肃东部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广阔的。

甘肃庆阳地区周族祖先的活动,一直延续到公刘时。据明清间编的《庆阳府志》载,该地有“公刘庄”;“在府城北三十里,有腴田数亩,号‘天子掌’,人莫敢垦。”清康熙年间编的《宁州志》亦载:“公刘旧邑,在州西一里,周之先公刘居此。《诗》云‘乃积乃仓’,即此地也。”《正宁县志·地理志》并称:“周为北豳地,公刘旧邑。”《诗·公刘》有云:“酌之用匏。”所谓“匏”,即用刀切葫芦对半剖开以盛水之物,或称“瓢”。今甘肃庆阳地区农村仍然沿用,俗名“瓜舀子”。庆阳温泉公社至今还有公刘庙,当地居民称为“老公殿”,传说周先祖公刘即生于庆阳。公刘是不窋之孙。《史记·周本纪》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然则周先祖在甘肃庆阳地区垦殖繁衍,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

#### 四、商朝早期徙至陕西彬县一带

周族祖先在公刘时进行第三次,《诗·大雅·公刘》记叙的就是这次的情况。诗云:“度其夕阳(西面之地),豳居允(信)荒(大)。笃公刘,于豳斯馆。”此处两次提到“豳”,并说要在那里“居”和“馆”可知公刘是到了豳地。《史记·周本纪》曰:“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这表明,庆节以豳作为国都,稳定地居住下来。周先祖最后一任后稷或不窋由今陕西武功窜至甘肃庆阳在夏末商初,而公刘之迁豳仅过了二代,其时应在商朝早期。

豳的地望历史记载也甚为明确。《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正义》引《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这里所谓“新平”、“漆县”,即今陕西邠(彬)县。《索隐》进一步指出:“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汉书·地理志》在“右扶风”“枸邑”县下班固自注曰:“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其地亦在今陕西彬县东北、旬邑县西南。

有一种说法认为:“豳、邠古今字,而汾、邠亦相通”,因而推定公刘所居的豳还在晋西

南的汾水下游一带。这是错误的。《诗·公刘》在“于豳斯馆”下即云：“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可知公刘为了在豳地建造宫室，曾使人横渡渭水，采取砺、锻之石。“若豳诚在汾，则晋地多山，胡为跋涉数百里之外，涉渭而不涉汾，以取厉锻乎？”此点实无法说通。况且，公刘的路线是由北向南。诗中又说：“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冈，乃覲于京。”显然，公刘的是为了改善环境。他往看百泉交灌的大原，越过南面的山冈，来到众所宜居的、可营造都邑的京地。这正和从甘肃庆阳到陕西彬县的方向和彬县周围水源丰富、原野广阔的情况相合。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彬县一带是周先祖的活动地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陕西长武县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址有司家河、胡家河、下孟村和碾子坡等，在彬县又有弥家河、雅店等遗址。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泾水工作队在长武县下孟村遗址就发现了不少先周文化遗物，并首次发现有钻有灼而无凿的先周卡骨。1979至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又在这一带进行复查，发现长武县冉店乡碾子坡是周人迁岐以前的一处重要先周文化居住址和葬地，它的早期遗存约稍早于周太王亶父时期，大致与安阳殷墟第二期（殷王武丁至祖甲）文化的年代相当。这里共发现房屋基址、窖穴、灰坑和烧陶窑址一百多处，发掘先周墓葬二百多座，出土石器、铜器、骨（角）器和陶器数量甚多。特别是在居住址中见到许多青铜工具和用具，如作为武器的铜镞、缝纫使用的铜锥以及青铜容器鼎和甗等，说明碾子坡先周遗址已经具有比较进步的青铜文化。

十分明显，周先祖自公刘、庆节，中经皇仆、差弗、毁榆、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直至太王亶父共十代人，长期在今陕西彬县及其周围的长武、旬邑等地经营开拓，使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 五、商朝晚期南移至岐山之阳

在太王亶父时，周先祖又作了第四次。《孟子·梁惠王下》云：“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诗·大雅·绵》、《史记·周本纪》俱载其事。《后汉书·西羌传》谓：“及（殷）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即太王亶父）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可知此时已值商朝晚期。

关于这次的路线，学术界的说法分歧甚大，必须作一番细致的辨析。《诗·绵》在开头叙



述道：“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这里的“沮”，高亨《诗经今注》云：“借为徂，往也。”不少学者信从此说。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在本诗中就有“自西徂东”之句，这个“徂”字才可释为“往”。在同一首诗中用同一个字，不得一处用其原字，一处又用其他字假借。诗人用字不可能混乱到这种地步。因此，“沮漆”二字当从《毛传》：“沮，水，漆，水也”。诗中之“土”，有些学者认为：“实即古史上经常提到的‘土方’”，并举《诗·长发》和武丁时卜辞为例，说明“土方”在夏、商时均居于今山西南部。因而这次“自土沮漆”的乃是从山西迁到陕西。这也是牵强附会的。按此“土方”字，《齐诗》作“杜”，与“沮、漆”均为水名。《汉书·地理志》在“右扶风”“杜阳”县下有班固自注：“杜水南入渭。”显然，杜、沮、漆都是邠地周围南流入渭的水。所谓“自土沮漆”，陈子展《诗经直解》今译为：“是在杜水、漆、沮水之侧”，甚符合诗的原意。全诗用这一句开场，实是说明周民在公亶父以前起初生活的地点。

《诗·绵》又叙述这次的经过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有的学者根据“率西水浒”，断定这次的路线是“从东西迁”，亦即由山西迁往陕西。这同样是一种误解。所谓“西水”高亨《诗经今注》释为“幽城西边的水”，它的流向应该是由北向南。杜、沮、漆水都南流入渭，沿着其水而行，自然应该是南迁。《穆天子传》卷二云：“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于东吴。”这也是太王“西迁”论者的一条证据。其实，这里的“西土”，乃是相对“东吴”而言；所谓“始作”，则是周人的一种观念，认为他们的伟大事业是从太王亶父开始的。《诗·鲁颂·閟宫》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故武王追尊先祖为王，从公亶父开始。根据这种观念，可知“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决不意味着太王之前在东，而由太王始西迁。

在阐述太王的路线时，还必须辨析一下梁山的地望。有些学者引《水经·河水注》：“（河水）又南出龙门口，汾水从东来注之，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又引《汉书·地理志》“左冯翊”“夏阳”县下班固自注：“《禹贡》梁山在西北”，据此认为，太王所逾之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北，从而证明太王之路线是从山西到陕西。这也是不符事实的。梁山的地理位置，《史记·周本纪·正义》说得很清楚：“《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好畤县（今陕西乾县）西北十八里。’郑玄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则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今陕西韩城

县)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东北,自豳适周,当逾之矣。”显然,太王所逾之梁山是其西端,在今乾县西北,而不是其东端,在今韩城县西北“临河”者。其实,主张太王西迁论者有一个最大的漏洞,就是由山西迁往陕西,必须渡过黄河,而有关太王的任何一种史料都没有“渡河”的记载,足见太王西迁论的站不住脚。

综上辨析表明,周族祖先的多次,是在今山西、陕西、甘肃三省的广阔范围内进行的。近年来的考古学发现,“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徐中舒先生称周原文化有山西和甘肃东西两个来源的考古学发现,是“经过长时期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概括,是我们研究西周史的起点”。这个考古学发现,也为研究周族祖先的史提供了科学的实物的证据。我们既不同意周族是起源于关中的土著,自后稷至太王一直活动于今陕西境内的观点,也不同意周族祖先长期滞留山西,至太王时始西迁至岐下的说法。晋西南、关中、甘肃庆阳都有周族祖先和活动的足迹,这就是我们在全面检验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近人研究成果之后所得出的结论。